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6215
14 December 198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83年12月9日

瓦努阿图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瓦努阿图共和国政府指示，谨随信附上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理沃尔特·利尼神父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及所附的国际大赦社关于东帝汶的报告。

谨请将利尼总理的信及所附报告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散发。

驻联合国代表

罗伯特·范利埃罗普 (签名)

附 件

1983年11月30日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理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信附上国际大赦社关于东帝汶的报告。

鉴于该领土目前的严重局势和上述报告的重要性，谨请将此报告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散发。

总 理

哈迪·利尼（签名）

附 文

日期：1983年8月

国际大赦社
国际秘书处
10, Southampton St.
伦敦, WC2E 7HF
英国

国际大赦社对东帝汶表示关注的声明

国际大赦社认为现在对印度尼西亚部队在东帝汶的行为以及所造成的对国际大赦社任务范围内人权的侵犯进行一次全面审查是适时的。国际大赦社最近收到的证据表明，官方政策宽容对人权最严重的侵犯。国际大赦社认为，现在有力的证据说明自1975年12月入侵以来，印度尼西亚驻东帝汶部队所进行的暴行是有组织的和持续不断的。

国际大赦社每次发表有关东帝汶的声明时都着重指出不能认为其资料是完整无缺的。因为印度尼西亚对该地严加控制，继续限制人员进入该领土，不让资料自由流出。东帝汶境内侵犯人权的情况，是在根本不存在言论自由权的背景下发生的。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人，都遭到拘留和虐待。¹ 在东帝汶内部和同外界的活动与通

¹ 包括下列事例：

- 一度参加过“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帝汶民主联盟的三人于1980年7月被捕和遭到拷打，据称是因为他们在Manu-kokorek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特图姆语节目中批评了印度尼西亚的占领；
- 印度尼西亚指派的区域人民代表的两名成员于1981年11月被捕，他们曾于1981年6月写信给苏哈托总统指责印度尼西亚军官和军事人员胡作非为，包括杀害东帝汶非战斗人员；
- 同来访的代表团和电视制作人员谈过话的一些人，后来即被召去审问。

讯都受到严格控制。国际大赦社还获悉，最近获准离境同国外家人团聚的东帝汶人，在临行前都受到印度尼西亚情报军官的循例警告，要他们不得透露可能有损印度尼西亚占领声誉的情况，并威胁他们如果透露，他们自己及仍留在东帝汶的家人将遭到报复。

尽管环境如此，我们还是收集到了有关东帝汶人权情况的大量证据。本声明所举的案例都是依据来自不同地方和互不相关的人士所提供的互相验证的证词。

虽然国际大赦社所获得的证据早已说明显然有不断侵犯人权的情况，但直到最近才得到直接证据，证明这些侵犯人权行为是受到官方允许的。最近国际大赦社收到1982年7至9月当时印度尼西亚驻东帝汶部队司令和他的情报官发给在东帝汶包考县服役的印度尼西亚军事人员的手册和准则的副本。

这些手册和准则的内容有：

(1) 在某些情况下准许在审问时使用身体上和心理上的酷刑，并提出如何避免暴露的办法：²

² 在《审问俘虏方法既定程序》手册中，题为“应避免的情况”一节内有一关于“使用武力和威胁”小节（V. 13）。虽然前言谈到使用武力和威胁一般应予以避免，但V. 13小节却允许使用武力和威胁，包括在某些情况下使用酷刑。该小节如下：

“V. 13 使用武力和威胁

希望不用武力进行审问，除非被审问者不肯讲出实情（含糊其词）。

然而，如需要使用武力时，不应让当地居民（响导、民兵、普通百姓）在场目睹，以免引起居民反感。

使用武力经常有这种后果，即被审问者出于害怕而提供假供，结果审问人要求什么就说什么。

避免拍摄表现酷刑的照片（某人受电刑、被剥光衣服等）。

注意这种文件/照片不得在外面/在Denpasar随便翻印，而被社会上不负责任的人取得。”

(2) 允许对被审问人进行生命威胁以保证他们合作；³

(3) 规定了将东帝汶革命阵线支持者及仍在丛林中的东帝汶革命阵线成员的家属运往“指定地点”，包括 Atauro 岛在内的政策。⁴

可以预料，这些指示所容许和规定的政策，执行起来会侵害到国际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容侵犯的权利。国际大赦社一向对驻东帝汶印度尼西亚部队的行为表示关切，其中包括使用酷刑，特别是在审问俘虏或投降的人时用刑，和非法处决特别是被认为支持东帝汶革命阵线的人。它又指出，它对把几千人运到 Atauro 岛表示关切，这些人在岛上的处境严重危害到他们的健康和福利。

还应当考虑的是，虽然印度尼西亚当局曾公开宣布把人运到 Atauro 岛的政策，但酷刑和非法处决的做法却显然不符合它公开宣布的、关于如何处置被俘或投降的

³ 关于乡村当局用来打破 GPK (东帝汶革命阵线) 支持网的各种办法的技术手册，第 3. C 节中有一段指示说：

“要指出，他们的朋友留得活命是因为坦白招供，并且愿意协助部队迅速恢复治安。

关于城镇和安置区保安制度的技术手册在第 V. 15. C. 3 节中，又向审问者建议一种技巧：

“向被审问的人保证，只要他坦白招供，并愿意协助推展行动，就可以活命。”

⁴ 关于乡村当局用来打破 GPK (东帝汶革命阵线) 支持网的各种办法的技术手册，第 3. d 节中说：

“把安置区内仍然存在的 GPK (东帝汶革命阵线) 支持网，以及还没有撤走的 GPK (东帝汶革命阵线) 家属撤到 Atauro 或其他指定的地点。” (着重号是原文就有的)

东帝汶人的政策。1977年8月，苏哈托总统本人曾宣布赦免投降的“东帝汶革命阵线残余分子”，并无条件保证他们的安全。大赦令的期限于1977年12月31日期满后又获得延期。当局不断在据认有东帝汶革命阵线分子的地区投下印有保证投降者安全的传单。当局还指使已经投降或被俘的人制作无线电广播和其他形式的宣传，表示他们并没有遭受伤害。据知还有投降的个别东帝汶人得到安全保证的例子。

审问和酷刑

国际大赦社收到许多关于东帝汶人因有反对印度尼西亚占领嫌疑而遭受酷刑的报告。这些报告所述的受酷刑的人常常是处于上面引述的审问手册中所述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被俘或投降后受到审问的时候。

有一名曾经替印度尼西亚情报机构工作的帝汶人曾描述这种情况下的审问程序：

“一般程序是审问被俘或投降的人。投降的人当中只要不是参与东帝汶革命阵线作战的战士就予以释放，但须事先得到帝力情报总部的批准。

在审问期间，通常会对他们用刑，特别是当审问者认为他们是东帝汶革命阵线战士或领导人的时候更是如此。用刑的方法是：用钝器打他们、用点着的香烟戳他们脸部嘴巴四周，或加以电击，有时还对生殖器施加电击。

审问后，由高级人员决定杀害那些人，大多数领导人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那些有才能的人都被杀害。他们的妻子也受到审问、酷刑和遭到杀害。”

上面的描述同国际大赦社所收到关于处置被俘和投降帝汶人个别事例的资料情节相符。向国际大赦社报告的事例之一是：1978年12月，当事人同另外六个人和他们的妻小，在包考区 Berecoli 村向印度尼西亚人投降。当时，由于印度尼西亚猛烈轰炸，使得东帝汶革命阵线控制下的大批民众不得不逃往 Katabian 山。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人了解到不可能提供足够粮食来养活随他们行动的大批民众，因此同意其中许多人投降。一个叫 P. 的人投降后被关在包考 Pousada（客栈）的车

房达一个月。这间客栈被改用作拘留中心，据估计当时另外还有600人关在该处。被拘留者都在晚间受到审问。P. 是在 Pousada 受审，但审问主要在包考兵营内进行。据他说，在讯问期间，有人用手枪威胁他。还有人把从一架小型发电机接来的电线绑在他拇指上，并通电震击。他说，其他人还被香烟烫伤，但他没有受到这种刑罚。被拘留在包考一个月后，他被移送帝力 Colmera 区 San Tai Ho 商店的仓库。当时，军方情报机构用这间仓库来进行审讯。⁵ 他被关在 San Tai Ho 仓库一星期后获释。

国际大赦社特别要提请注意在帝力的两所审讯房，据报，截至1983年年初，这两所审讯房仍在使用的。国际大赦社不断收到报告说，拘留在这类地方的人受到酷刑和虐待，这两所房屋是：

——一所仓库，位于 Colmera 区的 Rua Abilio Monteiro ，同原属 Francisco Babo 的一所房屋相连，据信，现在已被一个伞兵单位占用，最近已改称 Kopsandha；

——一所房屋，位于 Farol 区的 Rua Alfues Duarte O Arbiru，原属 Joao do Rosario Martires 所有。从1979年年底就被军方情报机构(A-I, 一般人称为 Intel)用来进行审讯。

国际大赦社收到一些报告说，被送进这些审讯房的人，离开时都带有明显可见的刑伤。谈到 Intel 房的一份这种报告说，

“1980年12月，我有一位参加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朋友遭到电击后，

⁵ 直到1979年末，军事情报当局都使用上述 San Tai Ho 仓库来进行审问。国际大赦社多次收到报告说，被关在 San Tai Ho 仓库的人受到酷刑。

他的嘴唇被灼伤破裂。他身上也有多处被香烟烫伤。因为当局怀疑他把情报传送给东帝汶革命阵线部队，所以对他用刑。”

在拘留待审和据称受到酷刑的人当中还有若干妇女，据报因为当局怀疑她们同丛林中的亲属通消息而被捕。国际大赦社存有情报当局拘留的几名妇女的姓名，据报，她们被强奸，有人还用燃着的香烟烫她们的乳房。

关于 Rue Abilio Monteiro 伞兵屋的一份报告证实它可怖的名声：

“如果你被送到那里，那就九成九没有希望了。被送到那里的人都是在山区同印度尼西亚部队作战时被捕的，特别是丛林指战员。审讯人员对他们用刑，以香烟烫面颊、乳房、耳部、生殖器，和利用电击，以逼问情报。然后，再把他们杀害。”

国际大赦社也存有曾被拘留在上述两所房屋之一，后来“失踪”，恐怕已被杀害的一些人的姓名。

1982年中期，一位告密者曾到过关押犯人的伞兵住地后面的仓库，据他讲他曾看到约有100人，从他们的外貌和衣着来看，他判定大部分是来自帝力以外的农民。国际大赦社不知道这些人目前的情况。但鉴于其它报告说曾被送到帝力审讯所去的人失踪的情况，有理由对这些人的安全感到关切。

其中一个案例涉及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成员佛纳西奥·葛梅斯 (Venancio Gomes)，该人在1975年12月印度尼西亚入侵后的头几天在帝力被捕。那些在此间被捕没有被立即处决⁶的人先被转到热带旅馆，然后在1976年1月又转到葡萄牙县监狱 (尽管Cadeia Comarca被印度尼西亚人改命为Lembaga Pemasyarakatan Dili，但人们仍然称其为Comarca)。佛纳西奥·葛梅斯于1979年从Comarca获释。1980年6月10日东帝汶革命阵线袭

⁶ 1975年12月11日据说，共有40多人在最初关押犯人的海关大楼里被杀害。

击帝力近郊的Dare广播电台后，据报道佛纳西奥·葛西斯又和其它600多人一起被捕。开始他被关押在Comarca，一个星期后被转到Farol的Intel所。此后他就失踪了。

国际大赦社收到有关在审讯中死于酷刑和拷打的人的报告，其它据报“失踪”的人可能也遭到同样命运。奥兰多·马盖(Orlando Marques)曾被印度尼西亚人任命为洛斯帕洛斯，Iliomar的卡马特(区长)，但在他参加爪哇的行政人员训练班后回来不久因被嫌疑心怀不满而被捕，据说在审讯中死于拷打。在1978年后期自首的阿尔丰梭·弗雷塔斯(Afonso Freitas)据说由于在包考的Pousada被关押时受拷打于1979年死于Vemassee家中。国际大赦社掌握14个人的名字，这些人据说都是在1980年6月10日东帝汶革命阵线袭击后在帝力和艾柳狱中被打死或饿死的。

对由于据传东帝汶革命阵线1981年1月准备袭击Bazartete和Likisa市而遭逮捕的人，国际大赦社收到对103个人审讯的详细资料，这103人除3人外据说都受到酷刑。1981年3月至4月这103人被送到Likisa区军事指挥部受审讯。这些人中有农民、学生、教师、政府官员、民兵成员和区人民代表大会数名成员，包括其主席在内。国际大赦社收到其中两个人写给地方行政官的两封信，这两个人签名承认参与了据传的袭击计划。其中一封信讲写信人开始如何坚决否认参与这一袭击计划，而后被印度尼西亚当局带去见一位关在军事指挥部监狱中过去的公务员。这个犯人对他说，“我没做过什么错事，可后来我还是招了，因为我受不了这种折磨。还是说慌，服从算了。”写信人后来又见了另外两位因据传的袭击而被捕的人，他们也讲受到极坏的虐待，逼他们承认参与过这一活动。写另外一封信的人也坚决否认参与此事。但他讲“我不得不屈服，因为我受不住拷打、脚踢和电刑……，而且他们甚至说如果我不招，他们就要象杀害东帝汶革命阵线的英雄一样把我杀死。如果不是由于拷打、脚踢、电刑而只是将我杀死，我还是有勇气坚持真理的。”对1981年3月至4月在利卡萨被捕的103人后来的命运国际大赦社不清楚。据说有些人被送往Atauro岛去。但也有些令人

不安的证据，表明其中很多人被杀害。上面提到的省议会成员1981年6月3日给苏哈托总统的信（见第1页注1）提到不久前收到的一份指控：

“在利卡萨县，军事指挥部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用电刑和其它火烫刑罚折磨数十人，然后将他们都杀害了。”

非法处决和“失踪的人”

大量证据表明印度尼西亚军队从入侵的初期一直在东帝汶大规模进行非法处决。国际大赦社现在掌握从1975年12月到1982年底据说被杀害的数百名非战斗人员或“失踪人员”名单。国际大赦社自己所进行的调查集中在1979年初以后的一段期间，发现不断出现大规模屠杀和“失踪人员”，以及一些显然是滥杀个人和小股人员的情事。

国际大赦社认为，毫无疑问在1978后期到1979年9月在整个领土上有数百名东帝汶人被杀。有些是在投降或被捕后被立即杀害，有些是过一段时间后被杀。另外一些人是被嫌疑与东帝汶革命阵线有联系，但又没有加入革命阵线在丛林中的部队。一份附在领土东部地区51名被杀人的名单的分析材料指出名单上的人在革命阵线中属于二等和三等级别，有些是从事民间职业的，根本没有参与战斗。国际大赦社对这些被杀人的调查也表明受害最严重的地区是该领土的东部，特别是洛斯帕洛斯县和马提本山附近的城镇和村庄。1979年4月15日至17日在马提本山附近的一次战斗中，118名非战斗人员据说在山南坡的Uatolari, Uatocarabau, Viqueque, Ossu, Baguia 和村子中被杀害。国际大赦社掌握在1979年5月至6月在Kelikai被杀的31个人的名单。有关这一期间情况的报告讲：

“一旦他们想要杀害一个人时，他们说他们已去继续求学，或者讲他们到雅加达或里斯本去了，或者说他们被紧急调到kelikai去。Kelikai是在马提本山角的一个行政区，他们在此杀害了很多人。提到Kelikai使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因为到了这里就意味必死无疑。”

另外国际大赦社掌握1979年在洛斯帕洛斯县据说失踪或被处决的82人名单。而且国际大赦社还掌握除东部地区以外其它地区据说被杀或“失踪的人”名单，包括艾柳和萨梅县和帝力县府。

下面是这一时期一些有典型的情况：

伊纳西奥·丰塞卡(Inacio de Fonseca)又名索朗(Solan)，1978年后在Ossu附近与他妻子一起自首。据说团长本人亲自向他保证他自首后生命安全。几个月后于1979年4月据说他在Kelikai被杀害。据说他被从包考用直升飞机送到Kelikai。“他们在行政官办事处附近降落。之后4个持枪的人将他带到教堂后面的小山上。他是第一个自首后被杀的人。”

安东尼奥·萨门托(Antonio Sarmiento)是Seloi地区的一个花匠，于1979年1月向印度尼西亚人自首。据说1979年7月一个夜晚印度尼西亚军队将他以东帝汶革命阵线嫌疑犯被捕，之后再也未见到过。

诺勃托·考雷依阿(Norberto Correia)是包考县Seical村的农民，1979年5月被带到Kelikai，被讯问关于他儿子参加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情况。他本人从未参加过东帝汶革命阵线。在讯问他有关他儿子的所在后，据说被杀害了。

乔·安特拉特·萨门托(Joao Andrade Sarmiento)于1978年10月或11月在维奎奎的Uatocarabau向印度尼西亚人自首，之后他回到洛斯帕洛斯的家里，继续做他的护士工作。1979年6月他和另外几个人据说在洛斯帕洛斯被捕，遭杀害。被杀害的人中有：汤米·克里斯托瓦奥(Tome Cristovao)，此人据说从来就不是革命阵线的同情者，是印度尼西亚人的翻译，但据说被嫌疑怀有不满情绪，因为他曾对洛斯帕洛斯县的杀人情况表示过抗议；贝纳第托·萨维奥(Benedito Savio)，该人在被杀时还是洛斯帕洛斯县长的助理。1979年被杀害的人中还有一些在入侵后已参加印度尼西亚人行政或军事机构的人。其中有乔·勃朗科(Joao Branco)率领的41人的军事单位。据说1979年7月3日41人被126营成员在包考的Gari Uai全部杀害。据说他们的罪名是1978年11月对马提本山袭击中背叛印度尼西亚人。

1979年期间，也有许多关于人民“失踪”的报告，特别是在帝力。一名于1979年上半年在东帝汶住过数月的印度尼西亚人在今年三月报告说“帝力的人民处在紧张状态中，因为有消息说余留的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人在深宵被绑架，下落不明”。一名1979年6月获准离开东帝汶的葡萄牙神甫，Leoneto Rego，描述他离开帝力时的情况说：“任何人只要与东帝汶革命阵线有牵连都不安全；他们随时会被带走，家人亦不知其去向，他们被送往某地，关入囚犯营，有时就干脆‘失踪’了”。

这段时期内有数名投降和被捕的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人在帝力和其他地方“失踪”。这些人中有几个是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1975年11月27日，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成立时被委任为部长的人：教育和文化部长，Hamis Basarewan Bin Umar；司法部长，Antonio Duarte Cavarino；财政部长，Juvenal Maria de Fatima Inacio；国防部副部长，Hermenegildo Alves；通讯和运输部副部长，Domingos de Costa Ribeiro；和中央委员会委员，Maria do Ceu Pereira Cavarino, Dulce Maria da Cruz, Sebastião Montalvão, Afonso Redentor de Araujo 和 Leopoldo Joaquim。

Leopoldo Joaquim，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委员，1978年初在领土西南的萨梅投降。印度尼西亚当局当时将此视为大事，把他的照片印在宣传单上，宣布他投降的消息。他投降后被拘禁在 San Tai Ho 仓库达数月之久。1979年4月，他被释放后不久，又被印度尼西亚部队从家中带走，并将其押往他17岁侄女 Maria Gorete Joaquim 家中。Maria Gorete Joaquim 曾于1976年被拘禁，当时她是东帝汶革命阵线学生组织，UNETIM. 的成员。两人均再被押走，据称送往包考做工。此后两人均纵迹不明。一些未经证实送往国际大赦社的报告称，两人已遭处决。

在帝力“失踪”的人中，有些是在“失踪”期间被禁在狱中。其中有东帝汶革命阵线武装部队司令，Domingos da Costa Ribeiro，据报他是1977年被捕并

送往帝力。 据报，他同另外十名被囚在 Comarco 的犯人于1979年4月18日夜间从监狱被提往帝力东部一处名叫 Areia Branca 的海边，被745营部队处决，该营是由印度尼西亚人领导的帝汶人的部队。 在这一群囚犯中还有 Filomeno Alves 和 Manecas Exposto，在入侵前他们是帝力一个名唤 Cinco do Oriente，流行乐团的成员，两人均于1979年1月在毛比塞投降。 Comarca，的另两名囚犯是，Joao de Conceicao，原为葡萄牙统治时代公务部内的一名官员，Joao Bosco Sarmiento Quintao，原为葡萄牙军中的宪兵。 两人均于1979年3月一天夜间被伞兵部队带走，随即未再露面。 国际大赦社收到的报告称，这两名囚犯已在帝力西部的塔西陀卢湖被杀。 国际大赦社接获过许多有关囚犯被带往 Areia Branca 和塔西陀卢湖后被杀的报告。

东帝汶革命阵线总统，Nicolau Lobato，的亲属，据报已于1978年12月的战斗中被杀，他们显然是被单挑选出来处死的。 Nicolau Lobato，的母亲，Felismina Lobato，连同她的几个孩子，据报于投降后被拘禁了一段时期，已于1979年3月或4月在维奎奎的 Lacluta，全部被杀。 Nicolau Lobato 的妹妹 Maria Lobato，妹夫 Moises Piedade 据报于1979年3月在包考的 Uai Bobo 被杀。 Nicolau Lobato 的叔父， Paolo 在投降后不久，于1980年底在帝力“失踪”。

国际大赦社自1979年以来不断收到关于“失踪”和处决的报告。 在帝力发生的另一次逮捕、屠杀和“失踪”的浪潮时间是在1980年6月10日东帝汶革命阵线进攻之后。 除了上述如 Venancio Gomes 的那种“失踪”以外，国际大赦社还接获了关于印度尼西亚指挥下的部队紧接革命阵线进攻后即放手大杀的报告。 在革命阵线进攻的达尔一地，据报即有五十户人家惨遭杀害以作为对进攻的报复。 6月进攻后在达尔发生的一些屠杀事件已由当时的帝力主教， Martinho da Costa Lopes，阁下向雅加达的大主教提出了报告。 1980年6月13日，据报一名 Norberto 在主教和数名神甫的陪同下向当地军事指挥官投降，并得到安全保证。 数日后，据报，该 Norberto 被带至达尔神学院大厅遭到民兵

队 (Hansip) 队员的殴打和酷刑。 据报他于 6 月 21 日, 被杀, 尸体投入深谷中。 主教的信中还报告了民兵队队员于 1980 年 7 月 2—3 日对三名男子和一名妇女。 公然进行酷刑和杀戮。 国际大赦社又接获报告, 1980 年 6 月 10 日的进攻后, 有 18 人在前往包考的路上被伞兵用卡车载往帝力东部靠 Becora 一个名叫 Fatu Ha'i 的地方。 据报这些人一下卡车便被枪杀, 尸体推往山坡下。 国际大赦社有一份 74 人的名单, 这些人都是 1980 年 6 月 10 日进攻后在帝力地区被处决, 被捕“失踪”或被酷刑致死的人。

在 1981 年 7—9 月的《保安行动》期间, 有数千名帝汶人被分编组成“人墙”, 用来围攻和清除残余的东帝汶革命阵线部队。 报告指出, 这些征调来的平民均被派往最危险的地方进行行动, 他们或是手无寸铁, 或是只有原始的武器, 被派在印度尼西亚部队前面前进。 国际大赦社收到的一些报告说, 那些从行动中生还者多因口粮不足而显出严重的身体虚弱。 更明显的是还有许多人根本不得生还。 目前已无法估计在行动中死亡的人数, 也无法查知他们死亡的确实情况。 国际大赦社收到的报告包括那次行动中非因战斗死亡的人。

B.. 一名 33 岁的前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成员, 1978 年投降, 1981 年 9 月某夜被印度尼西亚部队从帝力的 Grilos 地区他家中带走。 他是这段时期在帝力被强迫征召的 500 名成员之一。 今年 9 月, 这些在行动中死亡者的尸体被送回帝力。 其中包括有 B. 的尸体, 他是脑后中枪死亡的。 据目击他死亡的人报称, 他是在一个东帝汶革命阵线小队被俘设法逃脱后, 被印度尼西亚部队击毙的数名帝汶人之一。

虽然自 1981 年《保安行动》后, 国际大赦社即未再收到大规模屠杀和“失踪”的报告, 但个别被杀的报告仍然持续不断, 而且有理由令人担心的是, 由于没有任何明确意向显示要印度尼西亚部队依法守法行动, 因此, 印度尼西亚部队依靠大规模的野蛮措施来办事的情况随时可能出现。

国际大赦社继续收到如下的报告

— 1982年11月，JOSE Viegas, Augusto Bello, Augusto Gusmao, Cosmo Fresitas 四人因涉嫌与东帝汶革命阵线有牵连，在包考，维马塞被印度尼西亚部队逮捕。JOSE Viegas 是一名小学教师，据报于被捕后即被杀。其余三人据报因家属出面保护，被提送帝力，在 Taibesse 一座原葡萄牙的军营中拘禁了一段时期。

— 1982年11月，来自维奎奎的 Joao Brito 据报因殴打一名淫辱他妻子的印度尼西亚士兵后，在包考的 Venilale 被印度尼西亚士兵处死。

— 1982年10月，据报于前个月投降的 F. 在 Ainaro 被当众烧死。据报，他在投降后，被征召为印度尼西亚人工作，派往丛林中向其他的东帝汶革命阵线追随者劝降。他从丛林中返回后，Ainaro 镇即遭进攻。据报，印度尼西亚人指控他进行叛变，将他当众烧死以儆效尤。

阿陶罗及其他拘留处所

关于把一些人运往阿陶罗岛的报道始见于1980年年中，当时据报有数目不详的一批人涉嫌参与了前面所述的1980年6月10日的袭击事件，因而被送往该岛。1979年2月在马纳图托投诚的G是在6月袭击后于1980年7月被捕的，他是大约600人中的一员。入侵发生时他年仅13岁，被捕时也才17岁。在COLMETA县军区司令部受到审问并在帝力 Comarca 监狱被拘禁一个时期后，他被解往阿陶罗岛。他在上班的时候被捕，关于他的下落从未有人正式通知过他的家属。国际大赦社后又收到报告，说明自1980年12月至1981年4月又有几百名东帝汶人从洛斯帕洛斯、包考和利基萨等地区被解往阿陶罗。据报道说，这一期间这些被解往阿陶罗的人是涉嫌同情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平民，而非现役的游击队员。在此期间被解往阿陶罗并经国际大赦社查出其姓名的人，在被捕前是政府雇员、农民、教师和学生，实际上是从事民间活动的。但是，被解往阿陶罗的人大多数是1981年6月至9月执行治安行动期间被解往那里的，这一期间有3400多人被解送到该岛去。

解送该岛的人中有很大大一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J.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她的丈夫是东帝汶革命阵线成员。1981年初，印度尼西亚士兵在帝力把她找去讯问，她在盘问之下承认她丈夫还活着。结果，她自己、她妹妹、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全部被送往阿陶罗。另有涉及一名8岁男孩的事例，他是官方统计列为孤儿的16人中的一个。印度尼西亚当局得悉他哥哥是东帝汶革命阵线成员，还在丛林中活动，因而将他送往阿陶罗岛。

1980年至81年间被解往阿陶罗的人处境悲惨。当时被拘留者每周得到的配给口粮至多不过一罐头玉米，他们据说应由自己种粮食来弥补不足部分。实际上，该岛土地贫脊，更兼被拘留者老弱居多，因而自己种粮极端困难，多数人被迫捡拾树叶、根茎及其他可吃的东西充饥。官方统计数字表明，1981年6月至1982年5月被拘留者的死亡数字是176人。但是，国际大赦社得到的报

告表明，1981年下半年死亡营养不良、肠胃炎和疟疾的人数据报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全家被解送到阿陶罗的起初据说应由自己营造栖身之所，但是1981年12月把他们迁入新建的简陋棚屋里居住，每间屋20呎乘60呎，大约住60人左右。1982年2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访问阿陶罗之后，印度尼西亚当局同意由红十字会在阿陶罗岛执行一项紧急粮食和医药救济方案。

尽管印度尼西亚早先曾一再保证要关闭阿陶罗岛，可能在1982年中；可是这一年里该岛的被拘留人数大增，从1982年2月的3,280人增至1982年9月中的4,000多人。1983年初以来，据报有大批人被送返大陆。据了解，至1983年8月，仍然拘留在阿陶罗岛的人数已降到1,600人左右。国际大赦社得到的报告说，遣返大陆的人并不一定被送回其原来居住的村落。曾经被拘在阿陶罗的一群人据说没有被送回这一领土东部其原来的家园，而被送往极西部靠近马利亚纳的“安置村”里。

国际大赦社继续收到报告说，有些人未经控告或审讯而被拘留在阿陶罗以外的其他地方。现在据了解，帝力COMARCA监狱囚禁的政治犯人数远比1979年少，当时这所监狱据报道囚有700人左右，现在因政治原因被囚在那里的人数可能不超过十人。仍然拘禁在那里的人里面可能有哈努亚里奥（**Januario**）和戴维·希梅尼斯（**David Ximenes**）两表亲和马利亚诺·波纳帕尔特（**Mariano Bonaparte**），他们都是1980年6月10日事件后被捕的，还有五人⁷在印度尼西亚入侵时正在欧库西飞地服役，1977年晚些时候被解往Comarca监狱并一直被囚禁在那里。国际大赦社曾几次对Comarca

⁷ 他们的姓名是：文塞斯劳·德卡尔瓦霍（**Wenceslau de Carvalho**），维森特·努尼斯（**Vicente Nunes**），寨莱斯蒂诺·达康塞高（**Celestino da Conceicao**），何塞·阿加皮托（**Jose Agapito**）和埃斯皮里图·森托（**Espirito Santo**）。

监狱的情况表示关切。它知道自1980年以来，犯人的伙食和医疗有所改善，但是最近的报告证实狭中肺结核病流行。国际大赦社掌握有原先是犯人死于肺结核病的11人的名单，他们相信是在 Comarca 监狱染上肺结核病的。国际大赦社还得悉，囚犯必须付钱才能从 Comarca 监狱获释，至少有一些囚犯至今仍在狱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付不起这笔钱。

除帝力县监狱仍有一小批囚犯外，国际大赦社还频频收到报告说，其他一些拘留中心里还有一些未经审慎而被拘留的人。该领土13个县中，每个县均有附属地方军事和警察指挥部的拘留设施。收到的若干报告说，利基萨、瓦托拉里、维奎奎和包考等地的监狱里有若干因政治原因而遭拘留的人。还不断有报告说，艾柳和阿塔拜两地有据说是囚禁政治犯的特别拘留中心，以政治原因被逮捕的人被解往阿陶罗以外的东帝汶沿海诸岛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松巴哇和巴厘等岛屿。

除有一项不断安排访问阿陶罗岛的方案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除可前往帝力县监狱和洛斯帕洛斯军事指挥总部附设的一所监狱外，还没有获准前往其它任何监狱访问。据了解，即使那两所监狱，自1982年11月以来也未组织前往访问过。

结论

1983年7月20日，国际大赦社致函苏哈托总统，提请他注意，上述各手冊似乎正式容许施行酷刑，甚至可能容许杀害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支持者，国际大赦社对此甚为关切。国际大赦社在信中极力敦促苏哈托总统立即向其属下的所有部队发出指示，绝对禁止对囚犯施以酷刑。

国际大赦社提醒苏哈托总统说，它近年来曾多次向印度尼西亚政府表示，国际大赦社对颇传的印度尼西亚军队在东帝汶境内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甚为关切。国际大赦社提及先前于1980年4月写给苏哈托总统的一封信，对有关在东帝汶发生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表示关切，其中有报告说，曾有一批人向印度尼西亚军队投降或被其俘虏，后来这些人“失踪”了，可能已被处决。国际大赦社当时敦

促苏哈托总统指示东帝汶境内的印度尼西亚军队遵守他本人1977年8月提出的赦免条件，保障这些人的安全。

国际大赦社曾关切地表示，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似乎在东帝汶得到官方的怂容，印度尼西亚政府对此作出反应，否认国防和保安部曾颁发明确涉及东帝汶的手册。⁸

国际大赦社认为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答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国际大赦社说它得到的手册不是国防和保安部颁发的——正如那位发言人所说一样，而是由东帝汶军事指挥部颁发的，国际大赦社没有理由怀疑其真实可靠性。

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府没有正式保证不赞成手册中规定和怂容的那类政策，国际大赦社仍然对东帝汶的人权前景感到严重关切。由于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自印度尼西亚入侵以来，帝汶人个人的人权不断系统地遭到侵犯；由于没有证据表明印度尼西亚官方愿意取消那些长期政策，看来必然带来侵犯人权的后果，因此，国际大赦社仍然深为关怀的是，只要东帝汶人民表示反对印度尼西亚的占领，东帝汶人民的人权就会继续受到侵犯。

⁸ 据引用国防和保安部的一位发的人的话说，“我们从未颁发过这种关于东帝汶的手册”。他还说曾向印度尼西亚军队各单位颁发过一份一般性手册，但他拒谈细节。他说，由于东帝汶被视为印度尼西亚领土的一部分，因此不会颁发任何具体涉及东帝汶的专门手册。